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云南地方史讲义

(中)

方国瑜 主编

云南地方史讲义

中 册

木 芹 编 著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封面题字：张天放

责任编辑：黄有成

封面设计：金维和

云南地方史讲义中册目录

第二编 边郡时期（汉晋）的云南

第一章 西汉在西南夷的经营和郡县的建立·····	(1)
第一节 西南夷与巴蜀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1)
第二节 西汉对西南夷的积极经营·····	(4)
第三节 郡县的建立·····	(7)
第四节 西汉后期在西南夷的民族战争·····	(11)
第二章 郡县在南中的扩大·····	(15)
第一节 边郡制在南中的反复·····	(15)
第二节 永昌郡的建立·····	(19)
第三节 东汉在西南夷的民族战争·····	(23)
第三章 边郡在南中的大发展·····	(28)
第一节 大姓夷帅抗蜀·····	(28)
第二节 诸葛亮南征·····	(31)
第三节 蜀汉在南中的政策·····	(35)
第四章 南中郡县的衰落·····	(43)
第一节 南中郡县建置上的混乱·····	(43)
第二节 大姓称霸南中·····	(46)
第三节 民族关系紧张·····	(49)
第五章 南中郡县的特点·····	(56)
第一节 什么叫做边郡·····	(56)
第二节 从南中郡县看边郡制的特点·····	(60)
第三节 建立边郡的基本条件·····	(79)
本编结语·····	(86)

第三编 边州时期（唐宋）的云南

——南诏大理

第一章 研究南诏大理史状况·····	(91)
第一节 南诏大理史的范围·····	(91)
第二节 南诏大理史的资料·····	(95)
第三节 南诏大理史研究状况·····	(102)
第二章 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南诏前期社会·····	(103)
第一节 南诏地方政权的建立·····	(103)
第二节 南诏前期的政治制度·····	(106)
第三节 南诏政权的基础·····	(112)
第四节 南诏前期生产状况·····	(118)
第三章 唐诏苍洱之盟·····	(123)
第一节 天宝年间洱海区域的民族战争·····	(123)
第二节 唐王朝对南诏方针的改变·····	(131)
第三节 南诏对唐王朝的亲近·····	(136)
第四节 苍洱之盟·····	(141)
第五节 贞元册南诏·····	(145)
第四章 封建领主制度的确立·····	(152)
第一节 生产的迅速发展·····	(152)
第二节 封建领主制的确立·····	(155)
第三节 白族的形成·····	(162)
第五章 南诏蒙氏王族的复灭·····	(166)
第一节 蒙氏王族政治民族的危机·····	(166)
第二节 蒙氏从战争中求出路·····	(167)
第三节 摆脱危机的种种措施·····	(175)
第六章 蒙郑赵杨段的更迭·····	(182)

第一节	诸姓的更迭·····	(182)
第二节	郑赵杨篡权夭折·····	(185)
第三节	段氏政权的巩固·····	(187)
第七章	封建制度的巩固·····	(193)
第一节	大理与南诏一脉相承·····	(193)
第二节	封建领主制的巩固·····	(198)
第八章	封建领主社会的继续发展·····	(205)
第一	高氏专政·····	(205)
第二	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	(208)
第三	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215)
第九章	民族地区间社会发展不平衡性·····	(223)
第一节	以家支制度为特征的民族地区·····	(223)
第二节	以溪洞为其社会组织特徵的民族地区·····	(228)
第三节	以火西制度为特徵的民族地区·····	(234)
第十章	封建地主经济的发生和发展·····	(244)
第一节	地主经济的产生·····	(244)
第二节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巩固·····	(250)
第三节	社会生产的新发展·····	(255)
本编结语	·····	(257)
附录:		
第二编	纪事简表·····	(259)
第三编	纪事简表·····	(271)

第二编 边郡时期（汉晋）的云南

秦併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两汉巩固了她，发展了她。其后虽出现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却为隋唐更高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形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固然是汉族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边疆少数民族同汉族所结成的血肉关系当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唐书·回纥传》所说：“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决非虚构出来，而是汉晋以来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反映。

第一章 西汉在西南夷郡县的建立

第一节 西南夷与巴蜀经济

文化联系的加强

汉王朝建立后，经“文景之治”，地主经济迅速发展，造成了政治上的强大，最突出的是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又反过来使“山泽之财”集中，形成富有的“平输之藏”，也就是说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足以驾驭各地。与此同时，其经济势力伸向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内地产品长足进入边疆，並磁铁般吸引着各族人民，于是边疆特产源源流入内地，二者逐步交融，拆不掉，打不散。

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强大，统治者的贪欲，也跟着增长，就说汉武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胡羌以为苑囿，是以珍怪物充于后宫，騊駼馱骹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部之利亦饶矣。”（《盐铁论·未通篇》）统治者对珍奇异宝的强烈追求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珍怪物充于后宫，騊駼馱骹实于外厩”与边地经济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促进了“边部”经济的发展。不过“民间厌橘柚”之民间，当限于富有之民。

内地与边地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条件客观存在，且其势头愈往后愈突出，而用来实现（不同程度的）这一历史要求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众所周知的当然是民间互通有无的往还交流，再就是通过内地汉族商人为桥梁的交流，然而这一形式除了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封建的）外，在交换中往往是不等价的。再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封建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地主阶级是执政阶级的缘故。

派遣使节进行交流是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这是和平时期的主要形式。如“张騫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琅、鬬宝、明珠、玳瑁、虎珀、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筍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振扬威灵，被于幽裔，遂登九列，权节绣衣，剖符博望。”（《华阳国志·汉中志》）。又卷十《张騫传》亦载：“张騫为人，强大有谋，能涉远，为武帝开西域五十三国。……丰绝远之货，令帝无求不得，无思不服，至今方外开通，騫之功。”通过使团进行交流，政治上的强制性弱些，而且彼此得利，更重要的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历史发展总趋势，从而得到了“百蛮

乡风，歛塞来享”（《汉书·宣帝纪》）的效果，惟不能全归功于如张騫等少数几个人，当然其业绩也是不能抹煞的。

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就云南而言，具体反映在同四川的关系，而四川的经济文化很早就与中原并驾齐驱，《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两汉时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当时“凡郡县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续汉书·郡国志注》）而《汉书·地理志》载蜀郡成都、广汉雒县设有工官。正因为巴蜀经济文化亦发展着，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庾、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西南近笮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结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又《西南夷传》载：“秦时尝顿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按：指夜郎、滇、邛都、嵩、昆明。）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闭（按：闭字原作开字，从方国瑜校改）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僊僊、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巴蜀经济文化影响着西南各族社会的发展，而西南夷又丰富着巴蜀的经济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载卓氏在临邛（邛崃）“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僊千人。”又纪程郑亦冶铸于临邛，“要椎髻之民，富埒卓民。”又《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僊道县载：“本有僊人，故秦纪言僊童之富。”巴蜀之富，当与“西南夷”分不开，故《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南贾滇僊童，西近邛笮马旄牛。”总之，巴蜀与西南夷的经济文化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西汉对西南夷的积极经营

为满足物质上的贪欲，实现政治上的集中，首先为併南越计，探明道路，《史记·西南夷传》载：“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二五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即闽越，当时闽越王郢攻南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郡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当时南越王赵胡请降。）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溯珠江西源而止。）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毒县，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令甚易。’上许之。”巴蜀与南越关系密切，而夜郎乃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为出兵南越，先来经营夜郎地区。《史记·西南夷传》载：“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原作巴蜀笮关，今从王念孙校改。又王念孙《史记杂志》说“巴符关在符县。”今泸州合江县。）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远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按：方国瑜谓，不是把夜郎地置犍为郡，而是以其地属犍为郡。所以《汉书·地理志注》引应邵说犍为郡故夜郎国者误。而《史记索隐》引荀悦云‘夜郎，犍为属国’者是。）《史记·司马相如传》亦说：“相如为郡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

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

为了通夜郎，发兵南越，先开道筑路，《史记·西南夷传》载：“发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司马相如传》亦说：“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不便。”官方发士卒治道，两年未成，这当然指的是官道，官修驿道未成，惟原民间往来的道路是畅通的，且唐蒙已充分利用了巴蜀、夜郎、南越之民走出来的小径。又关于唐蒙略通夜郎的年代，方国瑜考辨说：“《史记·南越尉佗传》，王恢伐闽越在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设犍为郡，唐蒙初通夜郎也许在这一年或稍后。修路，不知从那一年起，《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未必从这一年起，大概修了两年没有完成，或者这时修路告一段落，再度发出命令。”

开南夷道，通夜郎，出于治越，但统治者不会也没有到此为止，其实以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论，也不会限于已经达到的程度，事实上，出现了修治西夷道，《史记·司马相如传》载：“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置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悦。”《史记·西南夷传》亦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邛

筰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慰十余县属蜀。”相如持节开越巂时间，方国瑜谓疑在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九年），因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书》有‘汉兴七十有八载’语。

汉王朝在“西南夷”的经营，开始时，有的获得成功，然而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说司马相如使西夷，“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以室其使，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所作《难蜀父老书》中，录蜀中耆老责备他的话说：“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盐铁论·地广》谓“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史记·平準书》纪之详：“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凿山通道千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汉通西南夷道，千里负担餽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亦见《汉书·食货志》）《史记·西南夷传》也说：“当是时，巴蜀四郡（《集解》引徐广曰：汉中、巴郡、广汉、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开通南夷、西夷二道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一是广汉、巴蜀之民负担加重了，加之士卒死者甚众，引起了怨恨，使其难以进行。二是在这之先，关于“西南夷”之利，巴蜀独享，现在中央王朝插手其间，且有独占之势，于是引起了巴蜀地方势力的抵制。三是在夜郎、邛筰开道置郡县，在平静的湖里，投去石头，必然溅起浪花，就是说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响，当时他们“攻吏”“阻道”等是反响

的一种形式。其实还有十分重要的一层，那便是汉王朝最高统治者那种享受对此等地区政治经济利益的心切，以致在不明情况的条件下，急于求成，因此碰壁是理所当然的了。不用说当时汉王朝不是专力经营“西南夷”，且有事朔方，《史记·平津侯传》（公孙弘）元光五年，拜公孙弘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西南夷传》说，治西南夷道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争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既疲于多头应付，而匈奴的威胁最大，故采用收缩力量，以专事北方的策略，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况且在西南已经发生麻烦，这就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秋，罢西南夷城”（《汉书·武帝纪》）的原由，汉王朝经近十年的经营，至此以罢置而告一段落。

第三节 郡县的建立

汉王朝停止经略西南是暂时的，既非统治者的本意，也不是人民的要求，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了解了一些情况，一旦有机会，封建统治者是不会放过的。过了四年时间，由于了解到西南通身毒后，更强烈地刺激了统治者的贪欲。《史

记·大宛传》载：“初却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又“骞曰：臣在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彊，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並出：出犍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笮、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这里所说通滇国之事，《史记·西南夷传》载：“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不仅由于物质享受上的追求，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身毒，争取西域众多势力，借以牵制匈奴，即由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下大力派使四出，然其想象的和具

体情况相距甚远，于是酝酿着更大的行动了。

封建统治者经营“西南夷”的目的，初为获取珍奇异物，扩大政治影响，进而使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得知蜀通身毒道后，不论从经济的或政治的诱惑力大为增长，为此，不但恢复已经中止的官方活动，而且加紧进行了，然而这种努力受到种种阻挠，而嵩、昆明尤甚，于是使出了最后一招，即用暴力来实现它，首当其冲的就是南夷。

所谓南夷即夜郎诸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越原已表归顺于汉，然首尾两端，后吕嘉专权反汉，就有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汉王朝出兵伐越的事，当时除桂阳、豫章、零陵三路兵外，还有夜郎兵为一路，“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但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史记·南越尉佗传》），汉王朝乘发夜郎兵平越之机，仗余三路兵威之势，以且兰杀犍为太守为借口，在夜郎地区进行设治了。《史记·西南夷传》载：“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元鼎六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即且兰）。头兰尝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也就在这期间，“西夷”诸部地，也实行了郡县，《史记·西南夷传》载：“南越破后，及汉诛兰、邛君，並杀笮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嵩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汉书·武帝纪》亦载：“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冬十月，令驰义侯征西南夷平之。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嵩、沈黎、文

山郡。”所谓“西夷”诸部地，也实现了设治。“南夷”、“西夷”诸部地设治后，所称“西南夷”地还余下滇及犍、昆明诸部区域尚未建立郡县，然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事实上仅过了两年，汉王朝又行动了。《史记·西南夷传》载：“上使王然于，以越破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举国降。（按：原作“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方国瑜谓《汉书》作“滇王离西夷，举国降。本书衍“难”“南”二字。离即丽，谓付丽西夷，举国降也。从所校改。）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汉书·武帝纪》也说：“元封二年，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犍、昆明诸部地，为益州郡所属，《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王者，庄蹻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为益州郡，后数年，复並昆明皆以属之。”並昆明之役亦为郭昌所为，《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兵击之。”虽经此役，然犹未能服，《史记·大宛传》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犍、牂牁、沈犁、汶山郡。却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得通。”郭昌等将兵击昆明，然仍未能说明设县，但是设叶榆、犍唐、不韦等县，

当在这期间。因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阑沧水、濇谿置牁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西南夷”地纳入了中国版图，正如方国瑜所说：“汉武帝时期，为了开发交通，从建元到元封以后，经过三十多年，发动经略西南夷，设置郡县，入中国版图。”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设置益州郡，共二十四个县，牂牁郡十七个县（十一个县在今云南境），越嶲郡十五个县（三个县在今云南境），政治招徕没有实现其目的，仍以暴力解决，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奇迹出现，既有暴力进行压服，就有用暴力进行反抗的行动，于是乎政治的、军事的交互使用，逐步深入，而被压迫的则以暴力反抗及受命二者交错进行，不管其自愿的程度有多大，与中原汉族的关系日密，乃至如胶似漆，终于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反抗、镇压，镇压反抗之事，不绝于书。

第四节 西汉后期在西南夷的民族战争

《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颇胡募吏民及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汉书·西南夷传》也说：“后二十三岁（指元封二年后二十三年）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二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此役似限于牂牁进行，反抗者虽说失败，不